

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

薛其林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

薛其林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从总论与分论两部分来构建民国学术研究的宏观体系。总论从民国学术的背景、特色、研究方法等阐述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文化创新的时代特征,分析民国学术从折中调和走向融合创新并由此奠定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特色;分论则依据民国学术演进发展的实际,以典型学者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来揭示民国学术融合创新的共同趋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薛其林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12

ISBN 7 - 81113 - 008 - 4

I. 融... II. 薛... III. 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民国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9649 号

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

Ronghe Chuangxin De Minguo Xueshu

作 者: 薛其林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21691(发行部), 8821594(编辑室), 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649312(发行部), 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pressxiaols@hnu. cn.

网 址: <http://press.hnu.cn>

总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32 开

印张: 12.25

字数: 353 千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 000 册

书号: ISBN 7 - 81113 - 008 - 4/B · 31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自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我始终关注中国近代学术问题。或许是自己的原因,或许是某些无法抗拒的因素,我在晚清佛学的研究之后,虽然涉足了近代经学的探索、中外文化交流之比较,也出版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专著,但是,我学术发展的道路却不自觉地顺着佛学、宗教学的方向越走越远,倒是在湖南的几个弟子,于有意无意之间,借“湘”之薪,传近代学术之火,薛其林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薛其林做博士生期间恰在上个世纪末,我的思绪正沉浸在百年学术的反思之中,并着手编撰《民国学案》赓续前贤。正像我在这套书的前言中所说,变与合的近代学术,在民国时期虽然使“家天下”的思想土崩瓦解,但是,“家天下的思想残余却在营建着封建的地盘;天下为公学术径路虽不再被君临天下的皇室误导而入于皇权掌上,也还是在荒漠的角落奋力挣扎”,“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感悟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聚集在一起,希望为保存、弘扬中华文化略尽绵薄。”其林适逢其会,成为编撰《民国学案》的主要合作者,民国学术研究也就作为他的主攻方向,而在“麓山湘水间驻足执业”。2002年,他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获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如今又有《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一书问世,即使算不得厚积薄发,也可谓好学不倦。

世界上各种文化因封闭格局的消融而有交流,因交流而有价值评判。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尤为显著。民国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新旧起承转合的关键时期,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交汇碰撞、比较参证、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特有的整合、调适、转向阶段。一时间硕彦俊杰竞起,著述繁兴,学科迭创,流派纷呈,汇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这一著作,与其前方法论研究不同,力图构建民国学术的宏观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古今中西文化融合创新的发展规律,从东方文化中心、西方文化中心、本位文化中心、非中心非本位等四个流派出发,以典型学者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揭示他们的共同趋向:融合创新。表面上看,激进与保守似乎势不两立,但本质上交融、渗透之处比比皆是,在思维的深层都具有大体相同的预设和逻辑推演。他们之间的分歧,如果排除各自立场、动机、眼界上存在的差异的话,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可信与可爱、求真与致用无法两全而导致取舍上的矛盾。从明清之际的“会通以求超胜”到晚清的“中西会通”;从“东方文化中心论”到“西方文化中心论”;从“中国本位文化论”到民族科学大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抉择与发展,尽管步履艰难,但硕果累累。无论是复古,还是创新,或者是折衷,实际上都是新文化创变的必由之路。

应当说,融会贯通,求同存异,吐故纳新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本书直抒胸臆,对文化本位论、中心论给予恳切的评判,在指出其有失偏颇之处外,强调求真与致用的密切关系,凸显非中心、非本位文化观产生的契机。比如王国维“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会通”论、傅斯年的“科学学术”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这些无疑都是对文化中心论、本位论在理论上的补充与修正。借此说明,中国文化理应“融异以为同”,万勿“标奇以立异”。虽为一家之说,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对民国学术研究既可说是别开生面,也可谓之“略尽绵薄”。

古智者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忽然而间,薛其林在民国学术研究领域頌然而壮;相识相交也有七八年的光景。本书出版,应当说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新的阶段,也是新的起步。欣然之余,匆匆此序,也为之勉。

麻天祥

2005年冬至序于珞珈之阳

序

本土、异域文化因异同而有交流,因交流而有价值评判;其层次和水平,取决于主体的视角与观念。主体的视角转移与观念更新,往往预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观的诞生。可以说,本土、异域文化的交汇、碰撞、融合、创新是人类文化演进发展的永恒主题,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时期,尤为显著,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明显的轨迹。如何评价本土的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多元文化?本土异域文化如何合理取舍衔接?便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起承转合的关键时期,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交汇碰撞、比较参证、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特有的整合、调适、转向阶段。一时间硕彦俊杰竞起,著述繁兴,学科迭创,流派纷呈,汇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对民国时期学术文化进行研究总结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民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曾一度是学术界的冷门。只是到近十年来,随着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展开,才渐渐为学人注目,但尚处于分散、凌乱的阶段:大陆学人重在个案研究,海外学人则局限于现代新儒家研究一隅,系统全面地展现此一时期学术风貌的成果尚付阙如。可见,系统全面研究民国学术,凸现古今中西学术及各流派内部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创新的全过程,揭示现代学术文化在近代世界性文化整合背景下的演进规律与成败得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极其必要。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跳出意识形态上的种种纠葛,以求真务实、平情立言的学术情怀,对这一时期学术思想进行全面研究评析也是完全可能的。

薛其林教授这本书从总论与分论两部分来构建民国学术文化的宏观体系,总论的三章内容主要从民国学术的背景、特色、研究方法等方面阐述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文化创新的线索与

理路,概括了民国学术从折中调和走向融合创新并由此奠定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人类文化(古今中西)融合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分论的五章,则依据民国学术演进发展的实际和学者的学术立场与文化视角,从东方文化中心、西方文化中心、本位文化中心、非中心非本位等四个流派出发,以典型学者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来揭示他们的共同趋向:融合创新。尽管路径不同,方法各异,甚至在具体问题的争论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构建新文化的总目标和采用融合创新的手段则是完全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

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作者认为,从表面上看激进与保守似乎势不两立,水火难容,但仔细探究,却发现并没有完全的界限,交叉、重复、渗透之处随处可见,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深层都具有共同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有的主张不同,但使用的材料、借用的理论则一;有的方法、路径不同,但目标则一。他们之间的分歧,如果排除各自立场、动机、眼界上存在的差异的话,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可信与可爱、求真与致用无法两全而导致取舍上的矛盾。从明清之际的“会通以求超胜”到晚清的“中西会通”;从“东方文化中心论”到“西方文化中心论”;从“中国本位文化论”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观,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抉择与发展,尽管负重前行,但硕果累累。因而,不管是守旧创新还是破旧创新,还是折中创新,都共同构成新文化创建所必然要走的正、反、合的过程。

作者接着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是派系的固执与偏见导致立场的僵化;一是地域隔绝所导致的心理上的排斥。就前者而言,思想和观念一旦成为主义,便会出现主义的独尊,便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倾向性。学派的出现,即意味着相应的派系的产生。而派系态度的产生会使思维习惯在相应的学术团体构成方式上形成整体的褊狭。这样一来,特定群体的偏见又导致立场的“僵化”。文化本位论、文化中心论的缺陷无疑就是这种僵化倾向。在“五四”前后多次有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争论中,文化中心论者,尤其是复古派与西化派各走极端,复古派只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因而主张“恢复固有文化”;西化派只强调文化的世界性,因而主张“全盘西化”。折衷派表面同意文化既有世界性,

又有民族性,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强调民族性,轻视世界性。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僵化和极端倾向,也就在学理上为对方的批判预留了空间。东方文化中心论、本位文化中心论者预设立场,相对忽视当下的政治变革、社会改造的需求,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性、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们比较注重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比较重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而不太注意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和批判;虽然正确地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却得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的错误结论。因而在文化上表现为追求玄远的“内心的自由”。这种缺乏世俗目标、无明确指向的“内心的自由”,又“必须服从于已被规定的道德信条”。而所有的“道德信条”都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结合更是理想主义的心灵之约。这种有关良知、责任等道德伦理的“心灵之约”,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如西方文化中心论等)的强大攻势面前,时常失语并显得苍白无力。

就后者而言,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正是基于地域和心理上的因素,在本土与异域文化交流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与排斥,尤其是在外来力量通过武力打破地域上隔绝状态,本土文化被迫开放和接纳异域文化的情况下,如清末和“五四”前后的中国,这种冲突和排斥就表现得尤为激烈,特别反映在心理上。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文化上的保守力量那么强大,那么持久,那么具有市场。文化本位中心论(不管是东方文化中心还是本位文化中心)之所以形成,并具有强大而持久的阵营与市场,也可由此获得解答。但文化大门一旦打开,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必然走上各种文化层面的碰撞、交流、融合、创新之路。落后文化终究要淘汰,先进文化终究要引进和确立。而且,越是本位主义、保守思想、抗拒力量强大,反本位、反保守的激进思想也就越拼命、越走极端,从而形成文化转型过程中激烈冲突的两极。“五四”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就是相对本土文化中心论和东方文化中心论而发展起来的另一极。在两

极之间,便是非中心非本位的文化创新主张以及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思想流派。

作者站在理性和客观的立场,对各种学术文化主张作出了合理的评价。认为,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思维视角各异,所以提出的有关新文化的构思也就存在差异。有的从中西文化的差别出发,强调传统文化的落后,主张全盘学习西方,而取西方文化中心态度;有的从中西文化的共性出发,强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旺盛,主张发扬国粹,而取东方文化中心态度;有的从文化惰性论出发,拼命走极端,而取“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态度;有的从本民族文化地位出发,力倡国粹,而取守旧创新的态度;有的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有的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平心而论,各家各派尽管互不服气,各自挾伐,但他们的主张都有合理的成分,可以说各有长短优劣,且深富意义价值。他们从各个方向发力,构成了新文化构建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为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为构建一个新型的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最后,作者对文化上的本位论、中心论作出了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新文化建设的方向。作者认为,只作玄远之思,放弃现实关切,是一大失误。同样,只关注此时此地的需要,不顾终极关怀,也是一大失误。文化中心论、本位论所存在的缺陷与弊端,就为非中心、非本位文化观的产生预留了疆域。于是就有了王国维的“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会通”论、傅斯年的“科学学术”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这无疑是对文化中心论、本位论在理论上的修正。作者进而指出,现代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理应“融异以为同”,不要“标奇以立异”;构建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预设立场和抱残守缺,而要积极消解分歧,融合异同新旧,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古今中西。这是新文化建设应有的心志,也是新建设的正确方向。

百年之后的今天,评价学术文化演进中的种种主张及其优劣得失是必要的,又是非常困难的。说必要,因为要不断推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反省和检讨以前走过的路,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取舍,通过合理价值评判,才能合理地趋新。说困难,因为一种文化主张的提出并能够成为一种流派,都有其必然的逻辑和合理的体系以及存在价值,

如何可能简单地加以判断呢？但不好说，并不是不能说，不要说。只是说不好说的话，有很多种方法。

平心而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确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彼此的拉锯是每个时代都要复归的主题。其复杂性、多样性并非三言两语就能道尽。就如同社会主义不必然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一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在现实上都是不切实际的提法，不管是坚持哪一方，都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但简单地折衷于两者，也同样无益。因为，中西文化问题不能两者折衷就了一百了。

所以，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学术多元化及其之间的互动，推动了这段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重新出现中西文化的大讨论与学术文化多元化局面，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表现。笔者相信，这种多元学术文化的兴起、交流、争辩，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中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这种学术文化的多元发展与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完成时代对文化建设的要求，完成中西文化融合创新的历史使命。

因此，薛其林教授通过系统研究、总结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探讨中国学术文化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就不仅仅是一种民国学术的历史探讨，尤其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所以，笔者十分高兴向读者推荐薛教授的《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这部著作，并希望这部新著给大家带来许多新的启迪。

朱汉民

2005.11.23

目 次

上篇:总论

第一章	民国学术的背景分析	1
第一节	社会背景:新旧急剧转型	1
第二节	学术背景:中西融合创新	12
第二章	民国学术的特色分析	32
第一节	从折中调和走向融合创新	34
第二节	现代学术范式确立	50
第三章	民国学术的方法论研究	62
第一节	科学实证方法	62
第二节	唯物辩证方法	77
第三节	义理阐释方法	97
第四节	直觉体悟方法	105
第五节	比较参证方法	126

下篇:分论

第四章	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	131
第一节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的“观通”、“化合”、“附益”说	132
第二节	梁漱溟、熊十力的“益欲中心”、“生命本体”说	162

第三节	冯友兰、贺麟、张君勱的“文化类型”、“和谐化合”、“模仿创造”说	188
第四节	钱穆的“合内外而开新”说	229
第五章	西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	240
第一节	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241
第二节	陈独秀、李大钊等的“西化论”	258
第六章	本位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	276
第一节	吴宓、汤用彤等学衡派的“本位文化论”	276
第二节	王新命等十教授的“本位文化论”	288
第七章	非中心非本位的兼容并包与融合创新	298
第一节	王国维的“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会通”论	299
第二节	傅斯年的“科学学术”论	308
第三节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	316
第八章	本位、中心论的批判与新文化建设	330
后记		373

上篇：总论

第一章 民国学术的背景分析

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起承转合的关键时期，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交汇碰撞、比较参证、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特有的整合、调适、转向阶段。一时间硕彦俊杰竞起，著述繁兴，学科迭创，流派纷呈，汇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变革的大背景是：社会急剧转型，走向无序；西学东渐，旧文化渐渐解构，新文化渐渐构建。小背景是：思维方式变革；旧学地位式微、新学地位日隆；现代学术范式确立。在这种背景下中西文化走上融合创新之路。

第一节 社会背景：新旧急剧转型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历史在风云激荡的巨变中跨越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既是封建旧中国衰败乃至灭亡的终点，又是现代化新中国萌芽壮大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建立结果并不成功的短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母胎。回顾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可以用“变”与“新”两个字来概括：百年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而百年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新政、新民、新文化就代表了百年思想文化的进路。“从 1898 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观念，再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宣言，‘新’这个词儿几乎伴随着旨在使中国摆脱以往的镣铐、成为一个‘现代’的

自由民族而发动的每一场社会和知识运动。”〔1〕著名学者王国维在谈论清代学术变迁时也指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2〕“新政”旨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模式，“新民”旨在实现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新文化”则是对二者的整合，是波及社会各层面的全新思想启蒙。它表明近百年的思想文化启蒙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表明现代化运动已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一、现代民主政制模式的探索——新政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历经30余年（1861~1895）的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内部开明人士为应对时代课题、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展开的雄心勃勃的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但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将这一希望化为梦幻泡影，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自下而上的大觉醒的契机。它有力地证明传统皇权机制培育的官本位意识和因循守旧的行为习惯从本质上阻碍了近代化诸因素的生长发育，证明传统官僚机制造成的庸才政治阻碍了近代化所需要的高效、优质政治队伍，证明这种扼杀人才创造力的官僚机制缺乏推动近代化所需要的政治革新能力和领导近代经济事务的实际能力。〔3〕正如《中国的现代化》作者罗兹曼所说：“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目标明确的行动太不相称，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4〕因此，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追求民主政治的国家模式的“新政”运动便在康、梁的首倡下开启了。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1901年的“仿行宪政”到1911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再到1949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以

〔1〕 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 王国维. 观堂集林: 卷23.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25~26

〔3〕 薛其林. 船炮·宪政·民主: 百年巨变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 1997, (5): 4~11

〔4〕 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74

民主为核心的“新政”运动在短短半个世纪走过了一段维新、改良、革命（由不彻底到彻底）的三部曲。

民主宪政思想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知识界即已萌发。魏源、徐继畲、梁廷枏、洪桂棣对西方民主宪政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介绍，并提出了相应的构想。1876年6月12日《万国公报》发表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回答了何为“民主国”、何为“议会制”的问题，并指明了三权分立的特征。最早在中国提出以西方议会制代替专制主张的是郑观应，其《易言》（1875年）第一次提出了“仿泰西之良法”，以“上下议院”来议定“国事”、“政事”，来通上下之情；其《盛世危言》指明了“君民共主”的议会制是中国“安内攘外”、致富致强的根本之途。在封建官僚中，郭嵩焘最早主张学习取法议会政治制度，1883年崔国因以官僚身份第一次上奏明确提出实行议院制，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陈炽、宋恕、胡礼垣等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君主专制的具体措施，从而把学习西方民主政治推上新的高峰。^{〔1〕}这些理论形态的民主立宪思想为康梁的“公车上书”和戊戌新政作了充分的准备。

康、梁沿着复古求解放的老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进行托古改制与仿洋改制，开启了近代“新政”运动的第一幕。托古是形式，仿洋是内容，打破专制独裁、建立民主政治是其核心。康有为公然主张“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他虽然主张保留皇帝，但皇帝已不是过去“口含天宪”的至尊，而是一个受资产阶级宪法约束的“木偶”。他在《日本变政考》中明确指出：“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他这里不仅阐明了“变器”、“变事”、“变政”、“变法”四者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抓住了变法的全局和本质，即改定国宪。这就超越了鸦片战争以

〔1〕 韦杰廷.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思潮.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来魏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局限，提出了以新质态取代旧质态的“全变”理论，从而将“新政”运动推到一个新的层面。

尽管康梁精心策划利用帝、后两党的矛盾，借光绪帝之名来推行“新政”，但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康梁新政的实质是反封建专制；光绪支持新政的实质却在于夺回实权——一个属于封建专制帝王的实权，不可否认，其支持明显带有利用康梁的功利目的；而慈禧既不愿意还权于帝，更讨厌光绪借外人来夺权，但从实质上看，她绝不容许康梁利用光绪来推翻满清的江山。表面上看，似乎康梁同光绪一起对抗慈禧，而实质上却是慈禧同光绪一道对抗康梁。帝党、后党、新党三方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本质上决定了“新政”失败的必然命运。从戊戌之后几十年的政治风波看，从袁氏复辟、张勋复辟到伪满王朝的出现，这些事实都可以反证这一结论。更何况，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尚处于奴性之觉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他们对于一个好皇帝的追求远胜过任何一种制度。

平心而论，戊戌新政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的成败，而在于它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自觉尝试自上而下反封建的实践，并由此揭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政”浪潮。从1905年的清末“新政”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创立，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政”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其最大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新政”运动上的承前启后和政体上的创造性转化。在其一生当中，政治思想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一）由温和的维新改良到激进的起义革命的转化。孙在1895年曾上书李鸿章，提出与康梁类似的改良主张，但他从康梁的失败和统治者的顽固态度中得出了结论，认为：走温和的改良道路是政治上的幼稚，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所谓的“新政”当然是幻想，乃决意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果便是这一认识的直接成果。（二）由“仿洋改制”到化合中西的政体构想的转化。孙在反对封建专制，创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最初也与康梁一样走的

是“仿洋改制”的路子。但他不同于康梁的地方在于他深入剖析了西方民主的优劣，并在仿洋改制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这具体表现在他的“权”“能”分离和“五权分立”的构想上。他发现了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西方民主政制“权”“能”悖离的难题，并创设了克服这一难题的“权”“能”分离的新政治学理论和“五权宪法”的新民主政体。孙氏这种既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效能，又可以完全确保人民的权利，“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的“全民政治”，确是世界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发明和贡献。（三）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化。旧三民主义是孙氏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核心纲领，是全面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结晶，是模仿欧美并进而“驾欧美而上之”的思想精髓，是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药方。旧三民主义美则美矣，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势下却难以实行。国内的封建势力、官僚买办、军阀强人，国际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民生的掠夺、对中国政局的把持，使得孙氏的良好愿望难以在现实土壤上生根。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和“驾欧美而上之”的良好愿望使得孙氏渐渐倾向于寻求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健全的经济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倡行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孙氏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在“避害”（消除资本主义贫富不均）之心重于“兴利”（力争国家富强）之意的心态下，孙氏毅然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道路。可惜天不假年，事业半道而陨。

创业者道艰，承之者任重。反帝反封和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历史地落到共产党人身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经过28年的卓绝斗争，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新政”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近代内忧外患交至并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帝反封的“新政”史上，康梁维新改良的失败和孙中山武装起义、毛泽东武装斗争的胜利，说明：革命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与政治斗争的军事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过渡时期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点。